

瞿秋白在五卅运动时期的理论贡献

周永祥

六十年前，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，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运动。当时，瞿秋白是驻中央局的五个中央委员之一，也是五卅运动领导机构——行动委员会委员。他除了参加中央会议研究和制定决策，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帝斗争外，还根据中央的决定，创办和主编了党的第一张日报——《热血日报》，并在党中央机关刊物《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上，发表了十多篇有份量的关于五卅运动的论文，及时地宣传了党的方针、政策，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暴行、骗局，鞭挞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和买办阶级的破坏活动，批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妥协。他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，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，努力探讨和总结了五卅运动的历史经验，及时指导了爱国反帝运动的深入发展。

关于中国革命敌友的问题

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，也是革命的根本问题。五卅运动发生后，确有不少人“还没有分别谁是朋友谁是仇敌的明确的觉悟”^①。瞿秋白在他撰写的《热血日报》社论《谁是敌谁是友？》一文中指出，英、日、美、法等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，“列强帝国主义联合压迫我们”，“强横残暴”，“屠杀中国人”，因此中国人民对任何帝国主义都要丢掉幻想。

在运动中，瞿秋白还是注意斗争策略的，首先把帝国主义和他们国内的人民加以区别，只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，而不是“反对一切外国人”。其次，他还“主张缩短战线，不但只反对英国、日本，并且只反对英国、日本等的军阀财阀”。^②

瞿秋白还明确指出了国内的敌人是“军阀官僚买办阶级”。他指出：“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纯粹做帝国主义的工具，他们或者替日本反对英国人，（或者）替英国反对日本人，表面上似乎投合一部分的思想潮流；实际上他们完全是反动而压迫民众的。”“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”^③。

所以中国人民既要反对“外国人的压迫和剥削”，又要反对“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”^④，中国革命的目的，就是要“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者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——军阀”，^⑤揭示了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，必须反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历史规律。

① 《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》，载《向导》第143期。

②③ 《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》，载《向导》第119期。

④ 《“五卅”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》，载《向导》第129期。

⑤ 《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》，载《新青年》第3号。

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、买办阶级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，那末，中国人民的朋友是谁？瞿秋白说在国外中国人民的朋友只能是“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、工人、农民以及受到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”。

在国内，瞿秋白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广泛地联合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群众，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、买办阶级。工人阶级在和农民结成联盟的基础上所要团结的朋友，主要是“革命的知识界”和“一般小资产阶级”（有时称作“学生群众及一般商民”或“平民、小商和劳动者”）把他们归属革命派。而资产阶级，他认为这个阶级有妥协性，属妥协派，但与帝国主义有矛盾，有一定反帝要求，因而把资产阶级也划为团结的对象。

关于联合战线的问题

瞿秋白指出：“中国民族解放的总要求”使“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”^①。瞿秋白又进一步指出：甚至于使比较反动的资产阶级，也不能不加入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：譬如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，尚且敢于站出来主张关税自主、收回会审公堂等等。”^②这里所指的资产阶级（或称大资产阶级），实际上，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，当然，他们有更多的妥协性，但不能划为反动阶级。

瞿秋白用大量令人信服的事实，剖析了各个阶级在联合战线中的地位和政治态度。他说：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，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，处处是“先锋”、“最勇猛”、“最积极”、“最持久”。^③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联合战线，但最后，破坏联合战线。瞿秋白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。

瞿秋白得出结论说：“……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，不能不反抗，不能不实行阶级斗争。”而且这种斗争是“必不可免的”^④。这同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对资产阶级的“又联合又斗争”的策略是吻合的。瞿秋白还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，指出：“小资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运动里，也是动摇不定，组织不固，斗争力量非常薄弱。”^⑤当然，在这里瞿秋白对小资产阶级的估价，和上述的对上海总商会的认识一样，都有程度不同的偏激性和片面性。

五卅运动发生后，瞿秋白就注意到农民，指出：“甚至乡村中的农民，也应当帮助他们组织。”^⑥后来，他在总结五卅运动历史经验时，再次指出：“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……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。”显然，瞿秋白认为农民大众是联合战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而且中国革命若若离开农民，也是不能成功的。但是，五卅运动中，对农民的发动很少很少。他说：当时“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，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。”瞿秋白强调，要加强工农联盟，加强对农民的领导。一九二五年十月，他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，首先坚决赞成“耕田农有”的主张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，瞿秋白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又追述了五卅运动的历史教训，他说：“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，因为缺少农民参加（虽有红枪会等起来，但是太少，太迟了），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。”

瞿秋白认为：要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，不仅在国内要结成包括农民在内的广泛的反

① <“五卅”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>，载《向导》第125期。

②③④⑤ <“五卅”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>，载《向导》第129期。

⑥ <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>，载1925年6月15日《热血日报》。

帝民族统一战线”。而且“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，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作战。”因为各国革命“必然互相联系”。

关于武装斗争的问题

瞿秋白在党内是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。他对中国武装革命理论的建设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他在《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》一文中，总结五卅运动两个月来的革命形势时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“我们两个月来困苦的斗争，为什么至今还不能胜利？”他认为主要原因之一，就是“没有真正的人民武力。”不久，他又提出具体要求：“我们人民应当自己起来组织人民自卫军。”^①后来，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。瞿秋白又进一步指出建立革命武装的迫切性，他说：“民众在五卅失败之后，又加以帝国主义者公然的对奉张助战，只有使我们更深切的感觉武装自己实行打倒军阀统治之必要。”^②

一九二六年一月，瞿秋白在《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》一文中，运用列宁主义观点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，联系了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实际，再次论证武装夺取政权是唯一正确的革命手段。他引用列宁的话说：“劳动的完全解放，只有劳动者的武装革命能够达到。”他阐明十月革命的胜利，就是苏联共产党组织赤军，经过革命战争的结果。接着他又联系中国革命，指出：“只有巩固的革命势力大同盟（无产阶级、农民、革命的知识界及一般被压迫平民之大联合），组织了国民的武装势力，那时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才能有彻底的胜利，代表大多数教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的政府才能成立巩固，一切不平等条约才能废除！”

同年四月，瞿秋白撰写一篇专论《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》，^③全面阐发他的武装斗争的思想。这时，他的武装斗争思想又有了新的的发展。他指出：“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。”特别要注意的是，瞿秋白在论文中提出了“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”的科学论断。这一论断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观点。瞿秋白鉴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，又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，明确指出，中国革命已经到了“和帝国主义短兵相接，一决死生”的紧急关头。他说：“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。因此，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，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，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——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——军阀制度。”瞿秋白关于武装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，在北伐战争的前夜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瞿秋白在五卅运动时期所阐述的武装斗争思想，强调了要建立“人民武力”，进行“人民战争”（或革命战争），但是，他没有阐明人民武装和武装斗争的性质，没有具体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，必须要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。到一九二六年八月，他才明确提出要“武装农民”，“组织农民自卫军”^④的思想，到一九二七年二月，他才明确指出“工人自己的武装，也已经非常需要”，而且应当是“常备组织”^⑤。至于无产阶级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问题，瞿秋白在上述的《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》一文中，虽然指出革

① 《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》，载《向导》第134页。

② 《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》，载《新青年》第3号。

③ 见《新青年》第4号。

④ 《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》，载1984年第1期《文献与研究》。

⑤ 《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》，载1925年6月17日《热血日报》。

命战争如果没有“革命党的指导，始终难以战胜”，但是这里所指的“革命党”，究竟是什么革命党？他没有指明是无产阶级政党。到一九二七年五月，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，篡夺北伐战争的一部分成果，致使革命面临着紧急关头，这时，瞿秋白才开始注意无产阶级要掌握军队的领导权的问题。他指出无产阶级“以前所谓领导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……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，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。应当使军队中的指挥成分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分来代替和补充，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。”^①

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

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，这是革命成败的重要关键。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，瞿秋白在他撰写的《新青年之新宣言》中，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，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。他在分析“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”之后，明确指出“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，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。”“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，不怕‘打开天窗说亮话’，应当竭尽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。”这就公开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应由谁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的问题。当时，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，党的理论也处于创建阶段。中共“三大”宣言，曾指出中国国民党应在国民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，到中共“四大”，才改变这一观点，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。由此可见，秋白在一九二三年就首先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，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，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意义。

随后，瞿秋白在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，又具体阐明中国革命为什么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，为什么资产阶级不能来领导。他说：“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，他们除锁链而外，真是一无所有”，“不但要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，而且代表全民族的利益”，懂得“要解放自己，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。”^②瞿秋白还分析了无产阶级具有其他许多优点，他指出：无产阶级“有极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观念”，能“提出极具体的阶级和民族的政治、经济要求”，“有很严密的组织”^③。瞿秋白在总结五卅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指出：“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，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，而且在这斗争里证明了无产阶级是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。”^④

为什么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呢？瞿秋白指出：“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，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失败。”^⑤

① 《论中国革命中之六大问题》，见《六大以前》第735页。

② 《“五卅”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》，载《向导》第125期。

③ 《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“五卅”运动之前途》，载《向导》第128期。

④⑤ 《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》，载《新青年》第3号。